臺大歷史學報第 74 期
2024 年 12 月，頁 215–246

BIBLID1012-8514(2024)74pp.215–246
2024.3.10 收稿，2024.9.19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412_(74).0005

§研究討論§

「正常化」：英語學界的蘇聯東歐國家日常生活史研究

師義帆[*]・沈　驊[**]

提　要

本文梳理了近年來英語學界在「正常化」視角下關於蘇聯東歐國家 20 世紀 50–80 年代日常生活史的既有研究，本文認為，相關研究體現出對傳統極權主義模式（totalitarian model）的兩點反思：一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二是研究中的道德預設，而修正後的極權主義模式仍有解釋力不強等問題。在此基礎上，本文梳理「正常化」視角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發現這一時期民眾在與國家的互動中適應了政權，因而能與官方規則和諧共存、正常生活。大部分民眾（尤其是各種亞文化活動參與者）並沒有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抵抗政權，而是表現出既不支持、也不抵抗的態度。「正常化」視角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呈現出豐富的歷史細節，但仍需進一步提煉問題意識，警惕碎片化風險。

關鍵詞：蘇聯東歐國家　日常生活史　「正常化」　英語學界　極權主義模式

*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200241 上海市閔行區東川路 500 號法商南樓 211；E-mail: ecnushiyifan@gmail.com
**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本科生
200241 上海市閔行區東川路 500 號法商南樓 211；E-mail: shenxing1009@gmail.com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極權、抵抗及其不足
二、「正常化」路徑的緣起與發展
三、「正常化」視角下的日常生活
結　語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語學界的蘇聯東歐研究蓬勃發展，從美國的蘇聯學（Sovietology）開始，越來越多學者投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相關論著碩果累累，研究視角與範式也不斷發展變化。總體來看，英語學界的相關研究可以大致分為三個視角。

第一種是從國家出發的視角（例如傳統的極權主義模式〔totalitarian model〕），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如何全面控制社會。[1]這種視角興起於冷戰時期，透過對蘇聯「高層政治」的關注，最初主要應用在與美國的國際關係，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色彩；蘇聯解體後，面對相關批評，傳統極權主義模式的支持者通過增加限定詞等方式，對此視角做出了一系列修正，如提出後極權主義、官僚極權主義、低效極權主義

1 格里德（Peter Grieder）為極權主義模式辯護的文章細緻地梳理了這一理論的發展，見 Peter Grieder, “In Defence of Totalitarianism Theory as a Tool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8, no. 3–4 (October 2007, Oxfordshire), pp. 563–589; 相關代表研究，如冷戰期間的 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eds.,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Zbigniew K. Brzezinski,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冷戰後的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Richard Crampton,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nd Af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等。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概念，後文將詳細說明。

第二種研究視角關注社會的力量，尤其對蘇東國家內部民眾「抗爭」的歷史感興趣。[2]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學者利用解密檔案，重點研究了蘇聯東歐歷史上的一些重大社會抗議，包括 1953 年東德事件、1956 年波匈事件、1968 年布拉格之春等，以及這些抗議在政治轉型中的作用。

近年來流行的第三種研究視角，更加關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3]聚焦於「普通人的歷史」，尤其是「日常生活史」。透過口述訪談曾經生活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民眾，並收集他們的信件、日記以及回憶錄等民間材料，這一視角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發展，關注產業工人、專業人士、婦女、青年、作家、藝術家等社會群體的生活經驗，更加強調普通人的能動性（agency），並且以新的方法和理論，試圖闡明蘇聯東歐國家中複雜的「國家－社會」關係。

上述三種研究視角之間多有重疊，其內容遠比在此所做的簡要概括複雜。然而，其總體趨勢十分明朗，即從幾乎完全專注於高層次政治問題，轉向關注基層社會文化發展、日常歷史和能動性。

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揭示不同研究視角的發展軌跡和內在邏

2 相關代表研究如 Vladimir Shlapentokh,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the Soviet People: Changing Values in Post-Soviet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na Wierzbicka, "Antitotalitarian Language in Poland: Some Mechanisms of Linguistic Self-Defence," *Language and Society* 19, no. 1 (March 1990, Cambridge), pp. 1–59;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 Essay in Conceptual History," *World Politics* 45, no. 2 (January 1993, Cambridge), pp. 173–202 等。

3 這一視角是本文論述的重點，下文將詳細說明。相關代表研究有 Paulina Bren, *The Greengrocer and His TV: The Culture of Communism after the 1968 Prague Spr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Anne Gorsuch and Diane Koenker, eds., *The Socialist Sixties: Crossing Borders in the Second Worl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Gleb Tsipursky, *Socialist Fun: Youth, Consumption, and State-Sponsore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Cold War Soviet Union, 1945–1970*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6) 等。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輯；二是向讀者重點介紹上述第三種日常生活史視角的蘇東歷史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將先分析國家和社會研究視角的內容和發展脈絡；其次著眼於上述兩種視角的不足之處，以此分析第三種研究視角的起源；最後，介紹英語學界對蘇聯東歐國家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發展脈絡與研究成果，並分析其特點和局限性。

一、極權、抵抗及其不足

二戰後英語學界的蘇聯學研究，一般要追溯到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 1904–2005）1947 年在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以筆名「X」發表的〈蘇聯行為之根源〉（"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一文。[4]從這一時期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極權主義模式成為主導蘇聯學研究的關鍵範式。該模式的實質在於將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定義為極權主義國家，政治上實行一黨壟斷，具有「反人民特性」的蘇共執政菁英控制民眾，且政治體系高度意識形態化、個人崇拜盛行。[5]簡而言之，極權主義模式認為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是一個恐怖社會。[6]

極權主義模式的另一個學術熱潮，出現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瓦解後。這一研究視角討論的核心是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蘇聯東歐政權

4 于濱，〈從 X 到 Z：西方「蘇聯學」的興與衰〉，《俄羅斯研究》2011 年第 1 期（上海），頁 70；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4, no. 25 (July 1947, New York), pp. 566–582.

5 萬青松，〈冷戰期間美國蘇聯學的發展歷程考察〉，《冷戰國際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上海），頁 203。

6 比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認為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和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都是極權主義國家，「恐怖」是政權的本質；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 1901–1984）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1928–2017）也強調極權主義透過「恐怖的系統」實現「近乎完全的壟斷控制」社會。參見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p. 464;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p. 2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事實上和理論上都是極權主義的嗎？這一時期的許多研究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以東德為例，對於共產主義時期的東德社會，許多歷史學家在研究時首先把東德「概念化」為極權的獨裁統治政權，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政權下，黨和國家的統治被視作是中心的、無處不在的以及決定性的，社會和文化只是獨裁統治的產物和結果。[7]用這樣的概念對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進行研究，得到的結論當然是這些國家在理論和現實中都是極權主義的。

與極權主義模式針鋒相對的，則是關於「抵抗」的研究。一些學者指出，極權主義模式最大的問題在於過分高估政權的力量，認為其能完全控制社會，就像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在其〈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文中所說，「現行制度裡潛伏的危機總是會……導致種種政治與社會的動亂（1953 年在德國，1956 年在匈牙利、蘇聯和波蘭，1968 年在捷克和波蘭，1970 年和 1976 年在波蘭均發生過動亂）」。[8]有鑒於此，蘇東國家的政治危機和轉型成為他們最感興趣的研究對象。

以關於東德政權為何瓦解的研究為例，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 1915–2012）在其《退出、發聲和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反應》（*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書中提出，「退出」（選擇離開組織或不購買公司產品）和「發聲」（直接表達不滿），都是客戶不滿公司或組織業績惡化時使用的手段。[9]雖然這一理論主要適用於經濟活動，但赫希曼後來將之用於分

7 Jürgen Kocka, *Civil Society & Dictatorship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eban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0), p. 37.

8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Václav Havel, Steven Lukes and John Keane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alach Press, 1985), p. 87；中文翻譯參考瓦茨拉夫·哈維爾等著，崔衛平等譯，《無權力者的權力》（臺北：左岸文化，2003），頁 149。

9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垮臺，他認為「退出（移民）和發聲（向反對政權抗議示威）協同工作並相互加強，共同實現了政權的崩潰」。[10]

上述兩種研究範式在相互批評中發展，共同為理解蘇聯東歐國家的「國家－社會」關係提供了有益的見解，比如現代獨裁國家如何運行，以及政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社會等重要問題。但是，上述兩種範式也存在明顯不足。

第一個不足之處在於其理論模型本身。無論極權主義模式或抵抗模式都建立在二分法（dichotomy）之上，即將國家與社會視為對立的實體。[11]如哈維爾所說，「社會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生活在『謊言中』：他們在公共場合表現得好像支持意識形態邏輯的口號和訊息，儘管他們私下認為那是假的」。[12]事實上，權力關係遠比簡單的「國家與社會」（the state vs. the society）、「政權與群眾」（the regime vs. the masses）、「統治者與被統治者」（the rulers vs. the ruled）的二分法要複雜得多。這種二元對立導致理論視角的解釋力不足。

第二個不足之處在於兩種理論模型都暗含一個道德假設，即蘇聯東歐政權本質上是邪惡的，因此在研究中不應流露出對這些政權的支持之

10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p. 177.

11 許多日常生活史領域的學者都表達了對此二分法的批評。比如尤爾恰克（Alexei Yurchak）指出，二分法的產生與歷史書寫者所處的時代和意識形態有關，20 世紀 70 年代出版的日記和 90 年代出版的回憶錄對蘇聯日常生活的表述就完全不同。對大多數民眾來說，二分法沒有關注到民眾真實生活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區別，忽視了民眾的正常生活。海曼（Mary Heimann）認為，「我們自己的冷戰假設和偏見的包袱」導致了對共產黨國家民眾生活的不瞭解。墨菲（Thomas K. Murphy）也認為，二分法的理論框架「簡單地將善（我們）與惡（他們）進行了對比，因此易於理解，必要時可以用來進行反共宣傳，對付國內外的政治敵人」。參見 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8; Mary Heimann, “The Greengrocer and His TV: The Culture of Communism after the 1968 Prague Spring, by Paulina Bre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VI, no. 521 (August 2011, Oxford), pp. 1026–1027; Thomas K.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Lif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Communist Era*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8), p. 4.

12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23–9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部分極權主義模式的支持者認為，那些質疑極權特徵的人是天真的，他們懷念並且為一個畸形但意識形態正確的政權辯護，而且試圖粉飾這些國家的歷史：他們淡化鎮壓的廣度和深度，或突出社會主義具吸引力的方面（如所謂的社會福利、婦女解放、為建立一個平等社會所取得的進步等）。[13]而抵抗模式的支持者也指出，蘇東國家的政權是虛偽、不尊重人權的。[14]道德假設導致這兩種理論模型仍然未能完全脫離政治性的束縛。

菲茨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作為以日常生活史批判極權主義模式的先驅，她的研究挑戰了主流觀點，即史達林時期蘇聯社會的特點是僵化和壟斷的國家機構控制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她認為，許多人在史達林統治下過著一種雙重生活（double life），即同時有著「公開」與「私人」的自我，個人和團體能夠在政治體系的約束下行使能動性，並走出自己的道路。[15]因此，即使在史達林時期，蘇聯極權也並不那麼有效，仍存在社會的流動。[16]

就本文關注的時間段而言，許多學者認識到 20 世紀 50–80 年代的蘇聯東歐國家與史達林時期相比已有很大變化，各國共產黨控制政治和社會的程度大幅下降。因此，極權主義模式者修改定義，繼續將該模式應用於描述這一時期蘇聯東歐國家政治與社會。比如，林茨（Juan Linz, 1926–2013）認為，布里茲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 1906–1982）時期（1964–1982）的蘇聯加強了法律體系建設，但仍然是一種「沒有恐怖

13 Andrew I. Port, “Introduction: The Banalities of East German Historiography,” in *Becoming East German: Socialist Structures and Sensibilities after Hitler,* ed. Mary Fulbrook and Andrew I. Port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3), p. 7.

14 Jiří Hájek,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in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134–140.

15 Sheila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Sheila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極權主義」。[17]郭蘇建也指出，面對這一時期社會發生的新變化，要區分極權主義要素中的「本質部分」（essential components）和「操作性特徵」（operative features），才能把握這些政權最本質的特點。[18]簡而言之，擁護極權主義模式的學者們認為，社會控制的鬆綁並不是極權主義的終結，而是一種完善。

格里德（Peter Grieder）非常詳細地敘述了極權主義模式的變化。他指出，在二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一些歷史學家粗略地使用極權主義的概念，將國家和社會二分化，但是隨著理論發展，許多人注意到國家與社會的關聯。新的極權主義模式關注 20 世紀 50–80 年代的蘇聯東歐政權軟硬兼施，引導民眾服從，許多普通人也出於個人利益等複雜動機與政權合作。他表明，「只要靈活而務實地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在未來許多年內將繼續成為歷史學術的有用工具」。[19]

有些學者在研究這一時期的蘇東國家時，引入了一系列「包含連字符的限定詞」，以此修正和區分不同類型的極權主義，如「後極權主義」（post-），依靠恐怖和鎮壓之外的柔性方式全面控制社會；[20]「官僚極權主義」（bureaucratic-），依靠各層級黨對國家的監督，並且試圖通過官僚機構計畫和指導生活的方方面面；[21]「低效極權主義」（inefficient-），強調並非所有經濟與專業活動都屈從於國家的控制等。[22]

即便如此，這些修正後的極權主義模式仍然面臨挑戰。波特（Andrew I. Port）認為，修改極權主義定義會讓這個理論喪失本來的意

17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p. 74.

18 Sujian Guo, "The Totalitarian Model Revisite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September 1998, California), p. 280.

19 Grieder, "In Defence of Totalitarianism Theory as a Tool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pp. 563–589.

20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24–27.

21 Grieder, "In Defence of Totalitarianism Theory as a Tool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p. 577.

22 Grieder, "In Defence of Totalitarianism Theory as a Tool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p. 57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人們會詢問：「『理論』還剩下什麼？」[23]他進一步指出，同樣重要的是：「極權主義範式未能捕捉到日常生活的關鍵方面，並忽視了心態和文化傳統所扮演的角色」，「該理論沒有解釋，甚至沒有提及東德人——除了受其生活條件的限制和形成——瞭解自己的生活、應對挑戰和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的方式」。[24]波特據此指出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

二、「正常化」路徑的緣起與發展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蘇東國家檔案解密，同時出現大量民間材料（如私人信件、日記、回憶錄以及訪談資料），[25]學者得以深入瞭解一般民眾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體驗。新研究揭示的現象，對上述研究視角的兩點不足構成了有力的挑戰。

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指出，與許多政治科學家將蘇聯東歐國家中的民眾描述為「受害者」的觀點相反，許多民眾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真實感受，是他們過著一種「完美的正常生活」（perfectly ordinary life）。[26]比如，東德情結（Ostalgia）現象在原東德地區非常普遍。很多人認為，「我們有太多的自由了」，並且懷念「美好的過去」。[27]無獨有偶，捷克斯洛伐克的許多民眾也表現出強烈的懷舊情緒（nostalgia），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很享受先前在黨統治下的生活」，那段時光「和

23 Port, “Introduction: The Banalities of East German Historiography,” p. 6.

24 Port, “Introduction: The Banalities of East German Historiography,” p. 7.

25 相關史料的介紹，可以參看三卷本的 Thomas Rigges, ed., *Histories of Everyday Life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Cengage Learning, 2015). 這套書向讀者介紹與極權主義政權下日常生活有關的各種虛構及非虛構的材料，包括日記、書信、傳記、小說、詩詞等，也包含一些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如理論研究與歷史研究。

26 Mary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East German Society from Hitler to Honec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

27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 29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社會和諧並且相對平等」。[28]

上述曾經生活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民眾的訪談，表明以下兩點：第一，在這些國家內，國家與社會、政權與民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並非完全對立，許多普通民眾並沒有感受到來自國家的壓迫，而是很好地適應了政權的日常運作。第二，一些民眾並非政權的積極支持者，但也確實在這些國家內生活得非常正常，並未覺得「活在謊言裡」，也未主動反對政權。

研究日常生活史的學者正是從上述發現出發，希望更加細緻入微地理解蘇聯東歐國家的歷史，從而為「國家－社會」關係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解釋。這些學者之所以關注普通人的生活，並不是因為支持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反而是出於同情這些政權下大多數人、尤其是普通人的命運，才選擇書寫他們的歷史。

目前，關於蘇聯東歐國家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都同意一個基本觀點，即大多數普通人的生活是正常的，或者說，大多數普通人都融入並且適應了政權。學者們首先關注大多數生活正常的普通人，並研究他們的工作、教育、娛樂、消費以及宗教等，與生活直接相關的面向。其次，有別於聚焦高層政治的傳統研究路徑，注意學校中的學生團支部書記（secretary）、基層官員（local functionary）、民眾中的告密者（informant）等政治地位更低、但同時也參與政權運作的群體。研究發現，在蘇東國家，普通人享有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有著豐富的文化和日常活動，不會單調乏味，並且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政權運作。換句話說，他們融入了國家體系，還能從中為自己謀利。

當然，蘇東國家日常生活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傳統意義上容易被視為「反抗」政權的亞文化活動，比如瑜伽（yoga）、嬉皮（hippies）、搖滾（rock）、龐克（punk）、公社（commune）等。學者發現，這些亞文化參與者與國家的關係不是純然對立，儘管大多數參與者不支持政權，但並不表示他們是「異議者」（dissident），事實上，大多數普通

28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 16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對政權的態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

在某些情況下，日常生活研究如果過分強調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就會忽視一些政治體制在社會控制機制層面的獨特性。因此，在特殊環境之下，民眾不應該被認為和政權存在重大矛盾。正常化表明的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民眾往往服從於國家的統治，這是對「支持／抵抗」二分法的反思。所以，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民眾為什麼會服從統治，即統治者如何讓被統治者感受到正常？

這樣的問題意識促使以富布盧克為代表的學者提出「正常化」（normalization）理論，用以解釋民眾融入政權的過程。按照富布盧克的說法，正常化這一詞彙所表明的，是回歸（或渴望）某種「正常」。[29]正常化存在一定的標準，因此在探究之前，必須先確立定義。在不同體制下，正常的定義或許千差萬別，但一般來講，至少意味穩定及可預測，即生活穩定，並且對未來抱有期望。

「正常化」一詞並非源自蘇聯東歐日常生活史研究。研究東歐問題的學者首先將其用於描述蘇聯在鎮壓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衛星國的自由化改革後，所實行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安撫政策，[30]即「製造正常」的過程，顯示統治的穩定化和新統治規範的合法化。[31]因此，早期使用正常化這一概念的研究，往往關注政治權力的強制力及民眾的被迫服從。[32]而蘇聯東歐日常生活史中使用的「正常化」，意思是「使人感受到正常」。在此過程中，統治者實現了穩定的統治，民眾也接受並適應了這種體制之下的生活。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此處「正常化」並

29 Mary Fulbrook, “The Concept of ‘Normalisation’ and the GD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ower and Society in the GDR, 1961–1979: The “Normalisation of Rule”?*, ed. Mary Fulbrook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9), p. 3.

30 Fulbrook, “The Concept of ‘Normalisation’ and the GD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3.

31 Kieran Williams,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 Politics, 1968–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9–40.

32 Vladimir Kusin, *From Dubcek to Charler 77: A Study of ‘normalisation’ in Czechoslovak 1968–1978* (Edinburgh: Q Press, 1978), p. 14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表示這種統治是「合法」的。沿著這種思路，富布盧克指出：

> 當「新」事物最終被體驗為「常規」時，期望就會穩定下來：人們開始假設明天會和今天很像（不再存在威脅），規則本身也不會有太大變化，因此為達到個人目的，學習按規則行事是值得的。當「生活計畫」成為可能的背景下，今天的行動可能會在中期和長期的未來產生可預測的結果——包括選擇不服從的風險、可能的懲罰，以及在個人道德和政治考量中相權衡。[33]

普通民眾透過正常化的生活，可以開始從經驗上探索生活環境中顯性或隱性的新規則，而後選擇挑戰、忽視、面對，或者保持內心距離感地按照這些規則行事；或者將新的規範內化（可能是完全無意識地），假設他們的生活在某種未經檢驗的意義上是完全正常的。[34]

通過對「正常化」的討論，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一些國家日常生活可以作為斯科特（James C. Scott, 1936–2024）描述的抵抗手段。[35]在蘇東國家，即使是最具反抗性的亞文化活動參與者，處處受制於國家力量，他們感受的並非與國家對抗，而是無視專制政權，[36]或者處於政權的「外部」（*vnye*），自認為不受政權的影響（事實上與政權仍有著緊密的聯繫）。[37]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也是「正常」的。

學者使用不同的概念討論正常化，豐富了我們對正常狀態的理解。正常狀態，簡而言之，就是對國家政權既不支持也不抵抗，盡量避免與政權接觸。尤爾恰克的研究表明，在蘇聯大多數民眾的認知當中，積極

33 Fulbrook, "The Concept of 'Normalisation' and the GD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5. 引文中譯為筆者自譯，下同。

34 Fulbrook, "The Concept of 'Normalisation' and the GD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5.

35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6 Jeff Hayton, "Ignoring Dictatorship? Punk Rock, Subculture, and Entanglement in the GDR," i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The Creation of Alternative Spheres in the Soviet Bloc*, ed. Juliane Fürst and Josie McLellan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6), pp. 207–232.

37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 12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子（activists）和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s）都是不正常的，而「正常人」（normal'nye liudi / normal'nyi chelovek）介於這兩者之間。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這些既非積極分子又非異議人士的人，才是「我們」（*svoi*），或者「那些屬於我們圈子的人」（those who belong to our circle）。[38]

以菲爾斯特（Juliane Fürst）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退出」（drop out）的概念。他們指出，退出就是用「不去做什麼」取代「去做什麼」，人民可以拒絕融入既有的社會規範，並且自行創造或新增不同的社會規範。[39]許多學者都提出類似的概念來描述「正常」狀態，雖然名稱互異，但內涵大致相同，都表示普通人同時身處於國家的內部（inside）與外部（outside）。

正常狀態並不意味著對官方文化的亦步亦趨。與亞文化類似，這種「退出」文化也有其獨特的風格，[40]表現形式不一。例如，特定的文化群體擁有屬於自己的語言或詞彙，在這裡，語言不僅止於交流，還是身分建構的媒介。[41]蘇聯東歐青年的退出，意味著要與眾不同，他們秉持的不是一種固定的意識形態，這些文化也「並不是要反對什麼，而是站在一邊，自己觀察世界」。[42]換句話說，正常狀態顯示那些普通的被統治者們，通常能夠在政權的規則中「開闢出自己的自由」。[43]

通俗地講，正常化試圖打破接受與抵抗的對立關係，講述人們「不反抗」政權的故事。不反抗的原因眾多，有的在政權下享受著平凡的

38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 103.

39 Juliane Fürst, "Introduction: To Drop or Not to Drop?,"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3–8.

40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9).

41 Fürst, "Introduction: To Drop or Not to Drop?," p. 11.

42 Terje Toomistu, "The Imaginary Elsewhere of the Hippies in Soviet Estonia,"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47, 56.

43 Katherine Pence and Paul Betts, "Introduction," in *Socialist Modern: East German Everyday Culture and Politics*, ed. Katherine Pence and Paul Bett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 2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活；有人為了理想或利益，加入「參與式獨裁」（participatory dictatorship）的行列，即人們被政權制約的同時，也積極參與政權的社會和政治系統；[44]亦有追求特立獨行、進行「內部移民」（internal emigration）者，即身處蘇聯社會的同時，按照個別需求，重新解釋官方文化並實踐。[45]下文將以具體實例，展示近年來正常化視角下蘇東國家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

三、「正常化」視角下的日常生活

在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已經注意到，蘇聯東歐國家的日常生活非常複雜。一方面，自這些國家的檔案解密以來，基於豐富史料進行的研究，削弱了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神話。波特指出，在學者們期望找到女性解放證據的地方，反而發現了持續的性別歧視；在期望發現保證社會和物質安全的慷慨福利之處，卻經常發現住房、兒童保育甚至最基本的食品短缺；在期望發掘基層團結跡象的地方，實則發現了社會分歧。然而，另一方面，在他們以為會沉默的地方，卻發現令人驚訝和廣泛的批評意願；在認為會發現極權主義恐怖痕跡的地方，卻發現基層政權的壓制不像曾經假設的那樣無所不知或有效；儘管政權旨在完全控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所有領域，但其政策反而產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後果，這些後果往往與實際意圖無關。[46]

總的來說，既有研究涵蓋蘇東國家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揭示民眾「回歸正常」的多種方式。從最普通的民眾，到與基層民眾關係密切的黨團書記、基層官員，又或者是出賣鄰居的秘密警察、特立獨行的亞文化參與者，他們自認為過著相當正常的生活，與政權和諧共處，甚至

44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 12.

45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 132.

46 Port, "Introduction: The Banalities of East German Historiography," p. 1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協助維護政權的穩定。就像布倫（Paulina Bren）所說的，在蘇東國家的日常生活領域，「很難確定官方意識形態在哪裡結束，私人抗議在哪裡開始」，「安靜的生活」是 1950–80 年代蘇東國家的關鍵點。[47]下文將介紹一些相關領域。

（一）工作

工作是生活的保障，正常的生活離不開穩定的工作。在社會主義的構想中，工作應該是平等的，工人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一些研究表明，蘇聯東歐國家雖然不存在失業的現象，但民眾的工作遠沒有構想中的美好。作為國家主人的工人，自身並不具有決策的權力。[48]工廠對工人的生活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可以決定工人子女的上學問題、批准工人的旅遊申請等。工廠的位置、產品、工作的類型等會影響工資（即使大部分工資都不高）。雖然有對工人的激勵，但是物質獎賞的水準不高，晉陞管道也不暢通，因此大部分工人對工作沒有什麼責任心。[49]

其他職業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待遇各不相同。由於社會主義推崇體力勞動，知識分子（如教師）的地位低於大多數體力勞動者，薪資也往往低於工人。一些專業化較強的工作（如醫生）則呈現更加複雜的情況，社會問題、醫療條件等因素對這些工作有著各式各樣的影響。[50]精神病院的工作則較為特殊，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可以被解釋為幫助政權控制政治異議人士，反之，也可以解讀為為異議人士提供保護。[51]可見，不能對蘇東國家的各種工作一概而論，我們需要對不同職業分別探討，才能更準確地理解這些國家民眾的工作狀況。

47 Bren, *The Greengrocer and His TV*, pp. 173, 187.

48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 227.

49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19–20, 70.

50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24–26;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p. 89–114.

51 Maria-Alina Asavei, "Art and 'Madness': Weapons of the Marginal during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 6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而言之，蘇東國家的工作沒有理論構想的那樣完美，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民眾對健康與經濟的基本需求，大多數民眾也接受這樣的安排，顯示他們適應體制，並且能夠在其中正常的生活。

性別是工作中的重要因素。在蘇東國家，性別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效，生活在那一時期的很多女性認為當時不存在玻璃天花板。不過，在很多國家，單親母親比例不小，女性依然要承受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負擔。此外，在政府職務中，級別越高，女性的比例越少；大部分女性只能在社區一級任職。[52]

（二）教育

學者們普遍關注到，蘇東國家有全面的教育體系，從學前到成人教育的各個階段，都由國家提供。但是，教育高度政治化，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進行政治社會化，一些儀式必不可少。在蘇聯，政治儀式經常與歷史事件有關，並被用來鼓勵建立愛國傳統和態度，進而為蘇聯的社會和政治一體化服務。[53]此外，學校也會要求學生閱讀官方報紙、按照正確的政治標準做事等。

入學與政治密切相連，黨員子女容易進入好學校，有政治問題的學生很可能被學校拒之門外。平等成為學校生活的特徵，學生既不被允許表現得過於出色，也不會在考試中不通過，但不被允許自由發言。為了防止不及格，學生之間的相互幫助（即作弊）被默許。在成人教育方面，196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等許多學校都成立了專門的成人教育部門，到 1963 年，七分之一的成人參與了某種形式的成人教育，官方的目的是將這些人培養成「社會主義新人」。[54]

庫巴特（Friedrich Kuebart）觀察到，國家的政治社會化議程並不意

52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p. 141–175.

53 Friedrich Kuebart, "The Political Socialisation of Schoolchildren," in *Soviet Youth Culture*, ed. James Riorda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 110.

54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27–3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味官方真正達成以教育控制青年的目的，許多學生仍有很強的自主性。學生們面對學校的政治社會化活動，不會直接反對，但大多消極參與，或者尋找一些規避方式。學校建立的學生組織也往往難以吸引學生，官方希望學生自我管理，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55]在 1980 年代末期，官方的意識形態教育與政治社會化正在逐漸失去對學生的控制；反觀伴隨著西方文化的輸入，學生們脫離官方控制的趨勢則更加明顯。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表明，在教育方面，高度的意識形態化與相對較低的競爭，是蘇東社會主義體制最大的特徵，體制下的學生接受許多意識形態教育，但並不意味著學生本身受制於體制。在此過程中，學生的體驗多樣和豐富，他們融入並接受了學校的規範，並且可以正常地接受這些教育和儀式。

（三）消費

由於優先發展重工業而相對忽略生產民生物資，蘇聯東歐國家內商品經常短缺，民眾消費景象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社會中沒有消費行為。對物質基礎的滿足是維持國家合法性的重要因素，現有研究表明，在蘇東國家，消費仍然存在，且呈現出複雜的面貌。

蘇東國家經常面臨物資不足的困境，商品供應有限，普通人難以在商店貨架上找到稀缺物品。想要買到冰箱等稀有商品，需要在商店中有熟人或者直接賄賂店員；[56]一些水果（如香蕉）幾乎只有在聖誕節前才能買到。

很多蘇東國家設有專門售賣西方產品的特殊商店（如捷克斯洛伐克的 Tuzex 和東德的 Intershop），並且規定需有美元、德國馬克等西方「硬通貨」才能購買。這類商店最初主要服務外國遊客，但是事實上，從 1970 年代起，越來越多的本地人也能在這些商店消費，甚至在 1976

55 Kuebart, “The Political Socialisation of Schoolchildren,” pp. 113–116.

56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61–6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東德特許商店中 85%的收入來自東德人。[57]

在 1956 年匈牙利事件、1968 年布拉格之春等政治事件之後，官方積極促進消費，藉此換取民眾認同。以匈牙利為例，1960 年實行的新經濟機制（New Economic Mechanism, NEM），承認了銷售活動的合法性。實際狀況可見，匈牙利的商品種類逐漸豐富，企業利潤成為重要的考評標準；店員的服務態度發生巨大改變，開始注重顧客體驗；廣告內容愈趨豐富，與銷售相關的工作也變得更加專業化。[58]

旅遊也是消費行為重要的一環。在蘇東國家，旅遊分為兩類，到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其他國家旅遊相對容易，而到西方國家則需要層層審核，包括獲取基層黨組織與僱主的批准。在審核過程中，申請者任何政治上的疑點都會導致被拒絕出境。外匯兌換通常被嚴格限制。在捷克斯洛伐克，為了防止人民滯留不歸，民眾出國旅遊時，家庭成員至少有一人必須留在國內。[59]即使如此，仍然有許多人成功出國旅遊，其中不乏一去不回者。

總之，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人民不會消費。民眾在層層限制下，仍然達成對消費的追求。諸如賄賂店員購買稀缺商品、進入特殊商店購買外國產品、積極工作以換取旅遊資格等現象，顯示民眾已經適應了國家的消費體制。

（四）共產黨與青年團

在蘇東各國，共產黨掌握最高權力，黨員往往享有特殊待遇；青年團是黨領導下的組織，對青年進行組織教育和政治社會化。黨和團的宣傳話語在蘇東國家中無處不在。尤爾恰克將這些宣傳定義為「權威話語」

57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p. 42–44;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63–65.

58 Beth Greene, "Selling Market Socialism: Hungary in the 1960s," *Slavic Review* 73, no. 1 (Spring 2014, Cambridge), pp. 108–132.

59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69–7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uthoritative discourse），將民眾的反應分為「表述性」（constative）和「表演性」（performative）兩個層面。他認為，表述性表達的是可以被判斷為對錯的現實，表演性僅僅是儀式性的行為，沒有表達任何真實觀點，也不能被判斷為真實或錯誤。[60]大多數人對遍地宣傳視而不見，在日常行為中表演性多於表述性，黨委或團委書記也善於運用官方的權威話語，進行表演性發言。惟許多黨團幹部還是在維護官方權威話語的同時，試圖完成一些有價值的工作，堅持共產主義理想。[61]這也表明，黨既有控制社會的一面，也存在對社會妥協的一面。

毋庸置疑，在對社會的控制上，黨擁有絕對權力。比如，黨員身分在入學、找工作、申請住房時有很大優勢。與此同時，在現實生活中，黨也有無法控制的部分，但民眾並未藉機反抗，形成與黨和平共處的生活狀態。比如，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入黨動機幾乎與意識形態無關，而是為了獲得黨提供的良好待遇；不想入黨的人則宣稱「我還沒有做好入黨的準備」，就可以合法地拒絕入黨，免於受罰；《七七憲章》發表後，大部分黨員只要簽署反對此憲章的聲明，就可以免受牽連。[62]黨在很大程度上並未達成其完全控制社會的既定目的，而是和民眾形成了一種和諧的默契。

青年團更是如此。以蘇聯為例，從官方的視角來看，共青團（the Komsomol）是「黨訓練有素的儲備來源」，並幫助黨實施政策，試圖「以共產主義的方式組織和培訓年輕人，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並捍衛蘇維埃共和國」。蘇聯共青團成員最多時超過四千萬人。共青團主要有以下作用，首先是作為黨在年輕人中的代理人，在工業、農業、軍事、教育、社會領域和國際事務中執行黨的政策；其次，作為未來黨員和領導人的訓練場；第三，在政治上培訓、社交、控制，並將年輕人納入社會主義社會。另外，它還透過出版《共青團真理報》進行宣傳等方式，完成對

60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14–24.

61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36–76.

62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92–9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青年的控制。[63]

但事實上，這種努力並非總是有效。對於出生於 1950–60 年代的蘇聯青年來說，大部分學校、工廠、學院的共青團會議只是徒具形式；到了 1980 年代初，這些會議不再召開，僅以書面紀錄草草了事。[64]在 1970–80 年代的共青團會議上，書記開場的政治講話幾乎都有固定的模版，新的講稿只需將舊稿內容替換為布里茲涅夫的最新精神即可。[65]在單調的政治儀式之外，許多基層團幹部在權威話語範圍內充分發揮了自身的能動性，做了一些「有意義的工作」，比如以共青團名義舉辦體育比賽、業餘音樂會、讀書會、新年派對等娛樂活動，或是開展公共托育等志願活動。[66]到戈巴契夫執政初期，共青團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甚至建議轉型為面向年輕人的休閒組織。[67]可以說，最遲從 1970 年代開始，蘇聯共青團已經具有很強的娛樂性質，處理共青團事務的同時，按自己的想法開展活動，成為青年們「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五）基層互動

基層政權在蘇東國家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由於幹部面臨著代表國家或人民利益的矛盾，相比於黨中央的決策，基層幹部的行動對普通民眾更加重要，他們可以（並且被允許）按照自身意願對政策進行解釋。[68]

事實上，很多蘇東國家的基層幹部以代表國家開始職業生涯，但往往以成為「所管轄地區人民」（constituencies）利益的代表告終。在東德，基層幹部作為中介性力量，能夠決定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實踐中什麼是可能實現的、什麼是不可能實現的。[69]此外，

63 Jim Riordan, “The Komsomol,”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p. 19, 22, 26.

64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15–16.

65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83–87.

66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94, 158–206.

67 Riordan, “The Komsomol,” p. 35.

68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 160.

69 Fulbrook, “The Concept of ‘Normalisation’ and the GD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官方為民眾提供了抱怨和表達不滿的渠道，民眾被允許向基層幹部表達自己的觀點，容許適當的抱怨也成為將民眾納進體制的手段。[70]由此可見，蘇東國家的基層幹部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並非科層制機器中的螺絲釘，而是與民眾形成默契，權力的實際運作非常生動和複雜。

（六）閒暇、娛樂與亞文化

閒暇時間和娛樂文化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傳統研究認為，蘇東國家的生活是單調的。事實上，普通人的生活非常多元與複雜，官方致力於提供娛樂活動，許多地下的娛樂活動也同時存在。

從國家的視角來看，閒暇時間非常重要，因為在社會主義的理想中，閒暇時間應該用於發展天賦、能力、創造和健康。因此，官方經常在閒暇時間組織活動，如在東德，官方舉辦最多的是體育活動。此外，官方控制的興趣小組也廣泛存在；女性有專屬的組織，可以一起讀書，解決教育、健康等問題，在 1961 年，至少五分之一的女性參加了這樣的組織。[71]蘇聯也有大量學生自發形成的小組，這些小組則更傾向於突破官方限制，許多年輕人對官方的意識形態表達了反叛的態度。[72]

國家在娛樂活動中的另一個顯著作用，是促進各種「亞文化」（subculture）活動在青年群體中產生。比如蘇聯官方對「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宣傳和認可，使得學習外語、接觸外國文化的青年人成為進步的象徵。此外，官方推廣一些新技術（如短波收音機），使青年可以直接接觸西方流行文化。當然，黨對此仍然有所控制，國家一方面以干擾短波收音機等手段，使民眾無法收聽「反蘇」頻道；另一方面，黨透過漫畫等宣傳形式，批判沉迷於西方文化的年輕人，將他們描繪成「被寵壞的年輕人，盲目地追隨資產階級的影響，剝削他們勤勞的父母和老一輩」，但這種批評反而引發了意料之外的作用。由於青年們

70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p. 250–288.

71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p. 79–86.

72 Tanya Frisby, "Soviet Youth Culture,"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p. 1–1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不認為自己符合上述傲慢的形象，所以沒有把這些宣傳當作是對自己的批判，因此，他們並沒有因為這些批評而遠離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相反，西方服裝和音樂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批評「讓蘇聯那些既對西方音樂、服飾感興趣，又熱衷於工作、學習以及諸多其他追求的年輕人使用西方符號變得常態化了」。[73]

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這些非官方的青年文化，究竟是不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抵抗」？基於正常化視角的新研究大多認為，蘇聯東歐這些亞文化活動並不構成抵抗。有學者傾向於不使用「亞文化」，而以「反文化」（counterculture）概念來論述。反文化「挑戰唯一被允許合法化的官方文化」，廣義來說，它「可以被看作是與官方主導的文化存在系統性差異的觀念、目標、品味和假設」。[74]這些文化群體聲稱自己是非政治的，他們也希望自己的行為是非政治的。[75]

官方並不將大部分青年文化活動視為對政權的抵抗。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對這些群體的活動瞭若指掌，但既不會公開將其合法化，也不直接取締，而是採取限制手段。[76]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地下音樂會大都是秘密進行，但當地大部分警察都知道其存在；同時，參與地下音樂會的愛好者往往賄賂警察，而相安無事。[77]官方對宗教活動頗為寬容。基督教牧師對黨宣誓後，可以合法進行宗教活動，[78]與此同時，一些民族學家意識到，官方對穆斯林的無神論宣傳是失敗的，在穆斯林中亞和高加索地區，傳統的穆斯林社群相當不受蘇聯國家控制，[79]地方政府面對

73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158–206.

74 Paul Easton, "The Rock Music Community,"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 66.

75 Toomistu, "The Imaginary Elsewhere of the Hippies in Soviet Estonia," p. 45.

76 Irina Costache, "The Biography of a Scandal: Experimenting with Yoga during Romanian Late Socialism,"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 35.

77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39–40.

78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126–141.

79 Michael Kemper, *Studying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宗教相關的衝突時也會退讓。[80]同時，由於官方對宗教活動的管制日漸鬆弛，導致這些活動的自主性變強，在社會主義晚期，越來越多抗議者得到教堂的庇護。[81]

另一方面，青年並非出於抵抗動機參與亞文化活動。大部分參與者的目的有二：一是尋求身分的認同和標新立異，二是對娛樂的追求。西方文化的輸入是導致青年們探索自我認同的主要因素。例如，愛沙尼亞青年透過對 1960 年代西方嬉皮運動的想像和「模仿溝通」（mimetic communication），在當地發展出類似的青年運動，以此表達對身分的追求。[82]在波蘭，電腦市場的興起使得電腦普及化，年輕的愛好者參加青年團贊助的俱樂部課程而對電腦產生興趣，隨後他們退出了這些俱樂部，並開始作為盜版軟體的交易員獲利，形成以特定品牌電腦為紐帶的虛擬社區，以此在網路上創造了另一個社會身分。[83]對西方服飾的著迷，也體現了青年們對「西方」身分的追求。[84]但是當這些青年真正接觸西方後，發現現實的西方遠不如想像，這些追求即隨之消失。[85]

對娛樂的追求，主要體現在音樂、文學或笑話上。尤爾恰克發現，許多蘇聯青年在迷戀西方音樂的同時，仍然表示自己有堅實的「共產主義理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共青團幹部一方面認為為團服務是有意義的，一方面也對西方音樂、服飾等著迷。除了在校青年外，還有一些西方文化愛好者經常聚集在咖啡館等地閒聊；有人會主動選擇在鍋爐房工作，為的就是有更多時間來追求自己的興趣。這些人探討的內容都是非政治的，對政治亦不感興趣；同時，他們也不覺得身邊的秘密警

80 Murphy,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pp. 126–141.

81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pp. 269–288.

82 Toomistu, "The Imaginary Elsewhere of the Hippies in Soviet Estonia," pp. 41–62.

83 Patryk Wasiak,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with the Commodore 64: Polish Youth, Home Computers,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157–175.

84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170–175.

85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202–20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察會構成威脅。政治笑話也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政治笑話所嘲笑的對象不僅是政府領導人，還包括異議人士，而且說笑話的人往往不是抱著「抵抗」的心態。[86]

當然，抵抗的亞文化活動也同時存在，但未必與社會主義勢不兩立。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學生為了捍衛伊斯蘭傳統，參加祈禱、拒絕上課，他們自我認同為虔誠的宗教團體，或者想像自己是更廣泛的全球伊斯蘭教徒的一員，但並不必然表明他們退出主流的社會主義生活。比如，在宗教要求之外，他們的抗議包括「想更多地享受看電視的世俗樂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仍然融入社會主義社會。[87]在蘇聯的和平主義運動中，最初反核運動遭到官方打壓，但後來「大多數成員都對移民感興趣，而不是為和平而戰」，這種抵抗成為移民的手段，而非與官方壓制和平運動進行抗爭。[88]此外，還有一些抗議代表官方立場，比如從阿富汗戰場回來的蘇軍士兵認為蘇聯社會已經被西方文化污染，遂組成「阿富汗青年幫」（Afgantsy），他們不安於社會的自由，要捍衛傳統，「清除社會中那些羞辱蘇聯生活的嬉皮、龐克和搖滾粉絲」。[89]

總而言之，蘇東國家的民眾在閒暇時間絕非無所事事，而是有著豐富的活動；這些活動也並不是充滿異議，事實上官方與這些自發的娛樂活動達成了微妙的平衡。此外，這些活動價值多元，從追求娛樂，到反對官方，或者是捍衛傳統，表現出豐富多元的價值與形式，構成了蘇東國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景象。

86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p. 207–237, 141–157, 238–281.

87 Madigan Andrea Fichter, “Students Activists and Yugoslavia’s Islamic Revival,”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85–104.

88 Irina Gordeeva, “The Spirit of Pacifism: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Grassroots Peace Movement in the Late Soviet Period,”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129–156.

89 Jim Riordan, “Teenage Gangs, ‘Afgantsy’ and Neofascists,”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 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在筆者看來，目前英語學界蘇東國家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主線是「正常化」理論，沿著這一思路，關注蘇聯東歐政權下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各種面向。相關研究表明，學者們批判和修正傳統極權與抵抗思路，發展出對蘇聯東歐國家的民眾生活描述更加豐富細膩、解釋力更強的理論。

但是，在豐富的資料和多樣的研究對象背後，這些研究所解決的問題仍需有所創新。既有研究關注的案例越來越細緻、特殊，收集和使用的民間文獻和訪談資料也越來越多。比如，上文已經提及，在關於西方音樂、服飾等主流亞文化的研究之外，也有研究關注到代表性相對較弱的公社、電腦社群等案例。這些研究當然有填補空白的重要意義，但是從學術脈絡的角度來看，這些細緻的案例只是為一些經典的研究做了腳注。

觀察許多論著的參考文獻，可以發現一些重要概念與理論（比如尤爾恰克的研究）被反覆引用，已有學者注意到並且承認了這一點。例如，菲爾斯特自承在研究思路方面，一些概念（如「退出」）來自於尤爾恰克著作的啟發。[90]而具體的案例研究更是如此，瓦西亞克（Patryk Wasiak）表示，研究波蘭電腦使用者，發現青年使用家用電腦，創造了屬於他們的「想像的世界」，這個世界深受他們可獲得的西方文化以及社會經濟變化的知識所影響。但這其實是在尤爾恰克關於 20 世紀 80 年代蘇聯社會「退出」現象的研究基礎上，以「小而獨特的團體進行的『退出』」為例進行的個案考察。[91]菲爾斯特對「黃色潛水艇」（Yellow Submarine）公社的研究，也借助了尤爾恰克「外部」的概念。這個以披頭四樂團（The Beatles）歌曲命名的蘇聯公社，社員們咸認為是「退出」社會主義：其

90 Fürst, “Introduction: To Drop or Not to Drop?,” p. 19.

91 Wasiak,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with the Commodore 64,” p. 15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一部分人主張避免政治參與，另一部分人卻主張以政治改革或革命來改變現狀。因此，她筆下的「黃色潛水艇」公社是生活在外部（living in *vnye*）的完美展示。[92]揆諸這些研究成果，它們並沒有挑戰尤爾恰克的結論，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研究很難不被視為尤爾恰克研究的腳注。

我們可以發問，在知道大多數民眾融入政權或不抵抗政權之後，我們還能解決什麼問題？是否有可能從日常生活角度對社會主義政權的穩定性，或者對其解體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釋？總之，在筆者看來，隨著個案研究數量不斷增加，很多關於蘇聯東歐國家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不免陷入碎片化，無助於我們對社會主義政權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產生新的、更加深刻的認識。如何突破這一瓶頸，需要學者加以關注。

*本文受 2023 年度上海市白玉蘭人才計畫浦江項目「轉型的微觀史：改革開放初期凝聚社會共識的機制研究」（23PJC035）資助。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92 Juliane Fürst, "'We All Live in a Yellow Submarine:' Dropping Out in a Leningrad Commune,"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 18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近人研究

于　濱，〈從 X 到 Z：西方「蘇聯學」的興與衰〉，《俄羅斯研究》2011 年第 1 期，上海，頁 69–86。

萬青松，〈冷戰期間美國蘇聯學的發展歷程考察〉，《冷戰國際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上海，頁 193–228。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Asavei, Maria-Alina. “Art and ‘Madness’: Weapons of the Marginal during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63–84.

Bren, Paulina. *The Greengrocer and His TV: The Culture of Communism after the 1968 Prague Spr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Brzezinski, Zbigniew K.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Costache, Irina. “The Biography of a Scandal: Experimenting with Yoga during Romanian Late Socialism.”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23–40.

Crampton, Richard.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nd Af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Easton, Paul. “The Rock Music Community.”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p. 45–82.

Fichter, Madigan Andrea. “Students Activists and Yugoslavia’s Islamic Revival.”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85–104.

Fitzpatrick, Sheila.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Fitzpatrick, Sheila.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riedrich, Carl,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eds.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Frisby, Tanya. “Soviet Youth Culture.”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p. 1–15.

Fulbrook, Mary. *The People’s State: East German Society from Hitler to Honec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Fulbrook, Mary. “The Concept of ‘Normalisation’ and the GD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ower and Society in the GDR, 1961–1979: The “Normalisation of Rule”?*, edited by Mary Fulbrook, pp. 1–30.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9.

Fürst, Juliane, and Josie McLellan, eds.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The Creation of Alternative Spheres in the Soviet Bloc*.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6.

Fürst, Juliane. “‘We All Live in a Yellow Submarine:’ Dropping Out in a Leningrad Commune.”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179–206.

Fürst, Juliane. “Introduction: To Drop or Not to Drop?”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1–20.

Gordeeva, Irina. “The Spirit of Pacifism: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Grassroots Peace Movement in the Late Soviet Period.”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129–156.

Gorsuch, Anne, and Diane Koenker, eds. *The Socialist Sixties: Crossing Borders in the Second Worl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Greene, Beth. “Selling Market Socialism: Hungary in the 1960s.” *Slavic Review* 73, no. 1 (Spring 2014, Cambridge), pp. 108–132.

Grieder, Peter. “In Defence of Totalitarianism Theory as a Tool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8, no. 3–4 (October 2007, Oxfordshire), pp. 563–589.

Guo, Sujian. “The Totalitarian Model Revisite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September 1998, California), pp. 271–285.

Hájek, Jiří.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In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134–140.

Havel, Václav, Steven Lukes, and John Keane.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alach Press, 1985. 中譯本：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等著，崔衛平等譯，《無權力者的權力》。臺北：左岸文化，2003。

Havel, Václav.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23–96.

Hayton, Jeff. “Ignoring Dictatorship? Punk Rock, Subculture, and Entanglement in the GDR.”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207–232.

Hebdige, Dick.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9.

Heimann, Mary. “The Greengrocer and His TV: The Culture of Communism after the 1968 Prague Spring, by Paulina Bre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VI, no. 521 (August 2011, Oxford), pp. 1026–1027.

Hirschman, Albert 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Hirschman, Albert O. “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 Essay in Conceptual History.” *World Politics* 45, no. 2 (January 1993, Cambridge), pp. 173–202.

Kemper, Michael. *Studying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Kennan, George. “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4, no. 25 (July 1947, New York), pp. 566–5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ershaw, Ian,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Kocka, Jürgen. *Civil Society & Dictatorship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eban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0.

Kuebart, Friedrich. "The Political Socialisation of Schoolchildren."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p. 103–121.

Kusin, Vladimir. *From Dubcek to Charler 77: A Study of 'normalisation' in Czechoslovak 1968–1978*. Edinburgh: Q Press, 1978.

Linz, Juan J.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Murphy, Thomas K. *Czechoslovakia Behind the Curtain: Lif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Communist Era*.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8.

Pence, Katherine and Paul Betts. "Introduction." In *Socialist Modern: East German Everyday Cultur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Katherine Pence and Paul Betts, pp. 1–34.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ort, Andrew I. "Introduction: The Banalities of East German Historiography." In *Becoming East German: Socialist Structures and Sensibilities after Hitler*, edited by Mary Fulbrook and Andrew I. Port, pp. 1–30.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3.

Rigges, Thomas, ed. *Histories of Everyday Life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Cengage Learning, 2015.

Riordan, James, ed. *Soviet Youth Cultur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Riordan, Jim. "Teenage Gangs, 'Afgantsy' and Neofascists."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p. 122–142.

Riordan, Jim. "The Komsomol." In Riordan, *Soviet Youth Culture*, pp. 16–44.

Scott, James C.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hlapentokh, Vladimir.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the Soviet People: Changing Values in Post-Soviet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Toomistu, Terje. "The Imaginary Elsewhere of the Hippies in Soviet Estonia."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41–62.

Tsipursky, Gleb. *Socialist Fun: Youth, Consumption, and State-Sponsore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Cold War Soviet Union, 1945–1970*.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6.

Wasiak, Patryk.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with the Commodore 64: Polish Youth, Home Computers,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Fürst and McLellan, *Dropping out of Socialism*, pp. 157–175.

Wierzbicka, Anna. "Antitotalitarian Language in Poland: Some Mechanisms of Linguisti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lf-Defence." *Language and Society* 19, no. 1 (March 1990, Cambridge), pp. 1–59.

Williams, Kieran.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 Politics, 1968–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Yurchak, Alexei.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4 (Dec. 2024), pp. 215–246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412_(74).0005

§Note and Discussion§

"Normalization": Anglophone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Soviet Bloc

Shi, Yi-Fan* · Shen, X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Anglophone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lization." It argues that recent research on the everyday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in the Soviet Bloc during the 1950s to the 1980s highlights two key critiques of the traditional "totalitarian model":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and the moral assumptions embedded in the research. Despite these critiques, the revised totalitarian model still faces explanatory limitations. The "normalization" perspective reveals that people during this period "adapted" to the regime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state, allowing them to coexist with official rules and lead "normal" lives. Many individuals, particularly those engaged in various "subcultural" activities, did not actively resist the regime

*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oom 211, Law and Business Building (South), 500 Dongchu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ecnushiyifan@gmail.com

** Under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oom 211, Law and Business Building (South), 500 Dongchu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shenxing1009@gmail.com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ut rather maintained a stance of “neither support nor resistance.” While the “normalization” approach offers rich historical detail, further refinement of research focus is needed, and scholars should be cautious of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fragmentation.”

Keywords: Soviet Bloc,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normalization”, Anglophone scholarship, totalitarian mode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